

記董同龢先生

周法高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休研究員

董同龢先生（1911-1963）是民國二十五年（1936）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任研究生一年。據說當時董和周祖謨先生^②同時參加考試，董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是王力先生的學生；而周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是羅常培先生的學生。其中有一項是記音練習，原來趙元任先生在南京成立了語音實驗室，用鋁片記錄了好多方言，在當時實在是一種創舉。在考記音時，兩位都希望靠近一點記得好一點，在傅所長「拔尖兒」的原則之下作公平的競爭。結果因為兩個人都是成績優異，也都錄取了。

我在民國三十年（1941）冬天從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後到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見到董同龢先生的時候，他正在寫《廣韻重紐試釋》。當時好像很神秘似的，並不給人知道。後來在民國三十三年（1944），史語所因為排印困難，特別利用李莊的石印設備，出版《六同別錄》的時候，他和我同時發表有關「重紐」的研究。我的《切韻重紐的研究》原來是我碩士論文的一部分，那時加以擴充修正（手寫付印）。後來又編入《史語所集刊》第十三本頁四九——一七頁，在民國三十七年（1948）排印出版。我們二人並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共同獲得中央研究院的楊銓獎金，李方桂先生在對日抗戰前曾以《龍州台語》（後改為《龍州土語》）一書獲得此項獎金。董先生在民國三十三年（1944）出版了《上古音韻表稿》^③，後來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在台灣出版了《中國語音史》（後來又增加了現代方言的部分，改為《漢語音韻學》），成為台灣的大學裏聲韻學暢銷書。另外又發表了好些聲韻學的論文，奠定了他在漢語語音史研究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他在對日抗戰時參加整理《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在趙元任先生領銜之下，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出版。他又和丁聲樹先生記錄雲南、四川各縣的方言，後來在台由楊時逢先生整理，陸續出版。他在民國三十二年（1943）和我到成都去補充調查四川方言中沒有調查過的三十餘縣份，又單獨調查了四川的客家方言，在民國三十七年（1948）發表在《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中，題目是《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很受各方的重視。在民國四十八年（1959）出版了《四個閩南方言》一篇長文，可以算是一本專書，奠定了他在中國方言學上崇高的地位。同時又和趙榮煥合作，寫成了《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在他死後由史語所出版。晚年又研究高山族中的鄒語，用英文寫成一部《鄒語語法》，在他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六月十八日逝世後出版。所以他對於語言學的貢獻大體上可以分為漢語語音史、漢語方言學、台灣高山族中的鄒語諸方面。至於他來台後曾經翻譯《高本漢詩經註釋》，並且發表《古籍訓解和古語字義的研究——一個

工作計劃的擬議》一文，代表他對訓詁學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如果他不在五十二歲的時候去世，那麼他在這一方面的理想也許就可以實現了，這可以算是他對語言學的第二方面的貢獻了。

我雖然比董先生年輕四歲，可是我們在學術方面倒很談得來，我們彼此之間也作公平的競爭。他寫《廣韻重紐試釋》，我寫《廣韻重紐的研究》卻在他之前；他在民國四十三年(1954)出版《中國語音史》，我則在次年出版《中國語文研究》；他研究漢語方言，我則研究古代語法；他研究高山族語言，我則研究殷周金文；他翻譯《高本漢詩經註釋》，我則寫《顏氏家訓彙注》。所謂「不相菲薄不相師」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董先生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分析力，作起研究來很專心，有「一題未完不作它題」的習慣，所以效率很高。記得在復員還都以後，史語所接受某部的要求，研究外國地名人名的漢譯能否有規律可循，如果可能，那麼以後從譯名就可以還原。他拿了一部丹尼爾·瓊斯(Daniel Jones)的英語發音辭典，把裏面的近萬個專門名詞都按音節加以分析，足足花了一年的工夫，結果寫了一篇文章在《現代學報》登載出來，結論說是不可能替中文譯名訂下一定的規則。這本雜誌銷行不廣，蒙李光濤先生送給我一本，後來搬家時不知道放到哪兒去了。近年來他的弟子丁邦新先生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的時候，就沒有收錄這篇文章。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董先生治學的專心。他在台灣的時候，曾經對朱兆祥先生所主編的《國語日報》的語文乙刊回答讀者的問題：注音符號的ㄐ，ㄑ，後面可不可以不加介音「-」？他舉出三點理由條分縷析地說明須要加介音「-」的理由，可見他心思的細密。這一篇小文也沒有收進《選集》裏去。

不過「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他也未能例外。在李莊的時候，由於第四組(人類學)的德國鮑克蘭夫人說起貴州可能還有仡佬族存在，他就準備去調查仡佬語。仡佬是一種稀見的民族，其語言沒有詳細的記錄；如果能夠找到了，那是很有價值的。丁聲樹先生就問他要不要先準備一下，參考一些文獻。他回答說：「準備甚麼？兩個耳朵一隻筆就夠了。」丁大怒，對人說：「做學問要虛心，這樣的驕傲，如何能把學問做得好？」後來他就沒能去成，大概是丁從中阻撓的緣故。(在大陸，現在已有仡佬話的調查記錄，彌補了這個缺憾。)可是董卻是智慧型而又能苦幹的人，他曾經說：「蘇北，如臯、東台、泰縣一帶的話，現在雖然屬於下江官話區，可是底子是吳語，因為陽去聲白話讀陰平，文言讀去聲，入聲分陰陽，可以看出具有七個調，和吳語的聲韻系統相似。」董是在如臯生長的，雖然他的祖籍是武進。他的弟子丁邦新先生也是在如臯生長的，曾經寫過一篇《如臯方言的音韻》，登在《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六本(民國五十五年[1966])。我是在東台生長的。魏建功先生是在如臯生長的，曾經寫過《陰陽橋》一文，說明如臯方言裏面的鼻化元音很多，鼻化元音是古代陰聲和陽聲對轉的橋樑。而吳語裏頭鼻化元音也很多，甚至失去鼻音。在我的家鄉有好些人家也傳說是蘇州一帶搬去的。像董先生這個見解就很具有啟發性。丁邦

書和人

新先生也讚此說，不過現在南京大學任教的魯國堯先生（大概是泰縣人）卻主張泰縣、如臯、東台一帶的方言，是用客家方言做底子，並寫成一文發表。究竟誰的說法對，還要詳加考訂。董先生的肯吃苦由以下一事可以得到證明：他晚年帶著學生到台灣山地去調查山地語，因為食物不合口味，加以工作過度，而得了嚴重的黃疸阻塞症，在台大開刀後不久就去世了。

董先生是在民國三十二年（1943）由助理研究員升副研究員的，當時傅所長只想升一組（史學）的張政烺先生為副研究員，可是二組（語言學）的代主任李方桂先生和三組（考古學）的主任李濟先生主張同時升董同龢、高去尋先生為副研究員。聽說僵持了好久，後來還是三位一齊升了。

民國四十三年（1954），董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任「訪問學人」（visiting scholar）二年，期滿前趙元任先生介紹他到麻省理工學院參加研究英語漢語的電腦翻譯計劃，主持人問他用電腦從事英漢互譯有無成功之可能？他回答說：「沒有可能。」因此沒能留下來工作。「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在當時是很熱門的學問，美國政府花了千萬美金來支持，可是後來卻宣佈不再支持，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對學術認真的態度。他不惜在應徵時爽直地說出這種見解，可見他的懸直可愛了。後來沒有多久，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就聘請他任遠東系的正教授，可惜他因病逝世而不能應聘了。他的死亡確實是中國語言學界的大損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直諒多聞的好友。

- ① 關於董先生對語言學的貢獻，可參丁邦新《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編後記》，載於《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民國六十三年〔1974〕台北食貨出版社）。
- ② 周祖謨先生在史語所二年，寫成了《廣韻校勘記》，列為史語所的專刊。又出版《廣韻校本》，根據清初的澤存堂本《廣韻》，而把錯字及脫漏的字用朱筆改正在板框上面。這兩部書台灣都有翻印本。後來又在大陸出版《方言校本》、《問學集》，又校注《洛陽伽藍記》，輯校《切韻》殘卷等。民國七十年（1981）曾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演講，聲望日隆。周祖謨曾和羅常培先生合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兩漢部分，在民國四十七年（1958）出版。後來因為文化革命，未能繼續出版，不過他已把魏晉和南北朝部分的結論發表了，想不久全書當可出版。恰巧丁邦新先生在史語所出版了《魏晉韻部的研究》英文本，是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的。何大安先生寫成了《南北朝韻部的研究》（台灣大學博士論文，尚未出版）。將來兩兩相較，就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異同來。
- ③ 董先生的《上古音韻表稿》，其體例前無古人，實在是一種創舉。其特點是：用表格的形式確定每一個漢字的上古音韻地位，效法現代方言調查的方言字表，使讀者一目了然。這是他三十來歲的作品，是他的成名作，也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他除了列表以外，還批判了高本漢的上古音學說，很有見地，可以看出他的功力來。